



Karl Heinrich Marx

马克思人学的文化底蕴及其价值研究

朱荣英 著



人 民 教 育 出 版 社



Karl Heinrich Marx

马克思人学的文化底蕴及其价值研究

朱荣英 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忽晓萌

封面设计:王欢欢

责任校对:张红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人学的文化底蕴及其价值研究/朱荣英 著.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6.10

ISBN 978-7-01-016795-4

I. ①马… II. ①朱… III. ①马克思主义-人学-研究 IV. ①C91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37974 号

马克思人学的文化底蕴及其价值研究

MAKESI RENXUE DE WENHUA DIYUN JIQI JIAZHI YANJIU

朱荣英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龙之冉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2016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2.75

字数:337 千字

ISBN 978-7-01-016795-4 定价:46.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自序

当我们把人的各种问题置于哲学的核心予以研究时,哲学就成为不折不扣的人学。以哲学的方式去思考人的问题,几乎是所有爱智尚思之人的一种偏爱。笔者也不例外,在平素研习哲学时总是自觉不自觉地与人的生存、人的发展、人生意义、人生困惑、人的矛盾、人的悖谬等问题纠缠在一起,以至于陆续写了一些人学方面的小论文,久而久之对中西人学史有了一些系统性的思考,今天将其连缀整合在本书中,也算是了自己一个人学研究的梦想。

作为哲学的人学,是通过汲取哲学智慧并及时把握时代主题基础上生成与发展的,思入生活本源并引领时代前进,是人学的固有使命和根本职责。然而,只有与时代发生双向互动性关系,才能真正开启一场自我革命并推动时代变革向深层开掘。若疏离时代变革所需,一味蜗居书斋、存活在一片虚无世界中并固守着虚幻的幸福期许,人学就会随着时代的物化而迷失自己的本真精神和担当意识。人类文明发展史表明,任何一个伟大的人学理论都是一定时代的产物,它反映着自己时代的本质特征和基本要求,担负着赋予自己时代以新的内涵的历史使命,用它科学的理论思维为人类指明前进的方向,从而推动社会的和谐构建与科学发展。作为哲学的人学,既是时代的产物又是时代的旗帜,只有在马克思主义先进人学体系的引领下,才能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全面进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也是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从马克思主义人学与时代双向互动关系层面,深刻认识并准确把握国内外形势新变化新特点,为继续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

战略机遇期、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进行智力支持,这对于确保我国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社会改革的深层发展催生了新的人学思想,而这些新的人学思想反过来又可以指导下一阶段的社会实践科学展开。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时代背景、主要矛盾和历史任务,这就需要马克思主义人学与时俱进、与世偕行,不断创新理论,引领时代潮流,不同的时代特征决定了人学的不同主题和理论形态的嬗变。一般地说,时代精神有着更宽泛的内涵,其表现形式也多种多样,但其精华却不是宽泛的和凌乱的,而是具有建立于一般的时代精神之上、能够思入生活并引领时代发展的一种精髓和神韵,那只能是这个时代的科学的人学思想。可见,作为时代精神之精华的人学,不仅仅是时代的产物,而且直接表现为能够引导时代发展的精神旗帜。这样看来,从本质上讲,人学思想不仅仅诞生于一定时代,而且能够超越特定时代,成为引导时代发展的精神源泉与动力。贫乏的时代往往与人学的贫困相联系,这是因为,贫乏的时代所面临的往往不仅仅是物质财富的短缺,以及随之而来的历史表现力的局限,而且还表现为时代精神不能尽情伸展,作为与时代内在相关的人学思想也会逐渐贫瘠起来。作为哲学的人学,虽然是高高地悬浮于空中的思想领域,它的智慧之根却深深地驻扎于时代内容之中,作为一种被把握在思想中的时代,它时时处处都表现为一种当代的文明。如果一种人学思想缺乏与时代的相关性,那它就毫无价值。只有对时代具有切身性关系的问题,才是值得面对和思考的时代性问题。换言之,人学问题并非因为它宏大而重要,亦非因为它思辨性极强而重要,而是因为它对时代具有切身性关系而重要。因此,传统的人学若常常迷头认影,丢掉自我,存活在一片虚无缥缈的世界中,固守着那些只在特种语言中才真正存在的虚幻的幸福期许,人学语义就会随着时代的物化而变得浮躁起来,丧失了自己应有的崇高使命和真性情,使自己的本真精神和守望者的操守皆处于遮蔽状态。

作为哲学的人学研究,不能仅仅成为理论家之间的文字游戏和无聊闲谈,更不能只是理论家个人的自说自话或者精神自慰,人学要想能够思入生活本源并引领时代前进,必须不断地进行革故鼎新、道与世更、历久弥新、与世偕

行,既要深入现实之中,又要超越现实之外;既要积极入世,又要洒脱超世,一种仅仅附着于生活表层、仅仅适应现实时尚的人学是不可能高瞻远瞩,不可能在关键的预示性时刻捕捉到时代发展的未来走势。当今中国最大的实际就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这是当代最突出的时代特征和最重要的时代内容,马克思主义人学只有对之发问并提供策略选择,才能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在当代中国,现代化、市场化、国际化和社会化这些重大的社会变革浓缩在同一个时空背景中,构成了一场极其特殊而复杂、艰难而壮阔的伟大的社会运动,它必然在各个层面引发一系列重大而深刻的理论问题,需要人学对之进行有深度的思想反思,这无疑将会为人们的人学思索与精神生产提供一个广阔的社会空间,关注这一伟大的时代跃迁,从中探讨并把握带有规律性的东西,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当代的精神支柱,这是当代中国人学理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最高职责。一旦人学从总体上把握住了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就会由此引发其固有的思维方式、生存方式、活动方式的重大改变,反过来,以一种面向 21 世纪的先锋理念引导现实运动的深层开掘,这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人学应有的时代良心和庄严使命。人学是不断发展着的科学,它严格以现实变革所需为依据,具有强烈的实践性和开放性;人学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经验以及各门具体科学为反思对象,同时又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当代的实践,引领社会进步与时代变迁。

目 录

自 序.....	1
第一章 中国古代的人学思想及其价值.....	1
第一节 天人之辩及其人性光辉.....	2
第二节 心性哲学及其人学理想.....	9
第三节 德知并重及其涵养功夫	20
第四节 人性本体及其转识成智	29
第五节 中国古代人学研究路向	40
第二章 中国近现代人学思想及其价值	55
第一节 成己之学及其人学要义	56
第二节 从人下手及其人学意涵	64
第三节 儒学复兴及其人学底蕴	73
第四节 人文精神及其思想特质	80
第五节 中国传统人学的现代化	88
第三章 西方哲学的人学理论及其价值.....	101
第一节 西方哲学及其人学路向.....	102
第二节 人是什么及其形上诉求.....	109
第三节 生活视域及其生命本质.....	118

第四节	人文主义及其生命悲歌·····	129
第五节	科技异化及其负面效应·····	137
第四章	西方人学的实质及其未来走向·····	148
第一节	物象化论及其人学悖论·····	148
第二节	西方人学的后现代走向·····	159
第三节	西方人学的存在论本质·····	167
第四节	四种生存维度之比较·····	175
第五节	生存悖论的现象学描述·····	185
第五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学转向与立场·····	198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学转向·····	199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人学的当代形态·····	212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人学的时代立场·····	223
第四节	马克思主义人学的思想境遇·····	237
第五节	人化自然及其客观事实·····	254
第六节	人的价值及其实践把握·····	264
第六章	马克思主义人学研究的当代价值·····	281
第一节	邓小平人民主体价值论·····	282
第二节	以人为本实现科学发展·····	292
第三节	以人为本开展三观培养·····	300
第四节	从人类中心到生态中心·····	311
第五节	哲学研究的为文与为人·····	322
第六节	马克思主义人学的后现代走势·····	333
参考文献 ·····		353
后 记 ·····		356

第一章 中国古代的人学思想及其价值

中国古代的人学思想源远流长,从《尚书》的“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到《管子》提出的“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再从孔子提出的“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到孟子论述的“民贵君轻”思想,“人本”“民本”思想一致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中心线索与核心内容。“我国古代思想家们很早就提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天地之间,莫贵于人’的朴素民本思想和‘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天人一致’,‘天人相应’,‘天人合一’的自然观,这些思想一直是我国历代政治思想家治国安邦思想的中心内容。”^①这些思想中含有许多积极的关于人的发展问题的合理因素,从不同方面强调了人的发展对民族兴旺发达、长治久安的意义,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意义,即使是在当代也具有一定的实践价值。但是,总的看来,就其思想实质来说,它是为了巩固统治阶级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并不是真正的以人为本、代表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哲学表达。相比之下,马克思主义哲学则真正是以人的发展理论为核心的最大意义上的人学,尊重人的地位与价值、强调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它的重要原则,使得关于人的发展理论的发展到了一个最新的高度。研究中国古代哲学的人学思想及其发展,目的在于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人学进行比较,凸显马克思主义人学中国化的文化底蕴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人的发展问题解决上的科学方

^① 吴东华:《传承与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进展研究》,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36 页。

法与实践途径。马克思主义人学像他的其他重要学说一样,并非离开人类文明大道而闭门造车的产物,也是站在诸多思想大家的肩膀上,汲取和利用以往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而不断创新、不断建构的理论成果。描述与梳理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的中西文化背景,试图表明马克思主义人学所阐释和揭示的一切内容与特质,实际上就是在继承与创新中西文化资源的前提下进行的,是对中西人学思想高度概括与批判改造中所实现的理论升华,它扬弃了中西人学的各种具体弊病与理论缺失,结合人类社会发展的特定需要与未来动势,增添了为西人学所不曾有的科学内涵,在人学思想史上实现了一次伟大的思想变革。

第一节 天人之辩及其人性光辉

道家顺天而化、道法自然的价值理想,及其强调对自然“制、用、使、化”而达返璞归真的理论主张,对解决当代物欲膨胀、生态失衡的生存困惑,都将不无裨益。而儒家天人相通、修其天爵的人生诉求及其尽心知性、参赞化育的道德标杆,对找回早已失落的精神家园、重建价值理性支点、复归异化的人性本质,也将产生重要的精神启迪作用。总之,先秦儒道“内圣外王”之理性诉求、“生生不息”之人性光辉、“内在超越”之研究理路、“实事求是”之思维风格以及“继绝开新”之终极关怀,必将以特有的非凡气度与民族情怀融入世界文化洪流中,经过特殊的现代化、世界化的文化洗礼和实践改造而积极发挥其鉴往知来、开拓创新的引领作用。而阐明儒道天人之辩中的人学思想以及关于人的发展问题的特殊理解,对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人的发展理论及其中国化问题,将大有裨益;梳理其中蕴含的人学思想,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性光华、人道主义理想,对今天构建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实现人与自然和合共生的友好发展,也极具现实价值。

中国古代人学非常重视天人关系问题,“天人之辩”是其争论最多、持续最长的核心论域之一^①,以至于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说,中国哲人治学

^① 参见宋志明:《独辟蹊径吐心声——冯契著〈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解析》,《东岳论丛》2015年第1期。

大抵旨在“亦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邵雍也说,“学不际天人,不足以为之学”^①。由于中国先秦哲人所说的“天”和“人”的具体内涵相当丰富且歧义颇多,因而天人关系自然也就相当复杂。其所说的“人”,既有实践上的知行主体之义,也有价值上的理想人格之义;既可指单独的个体,也可指一般的民众,还可指全体的人类。其所说的“天”,既是指“四时行、百物生”的自然之天,也是指“命于天、畜汝众”的主宰之天,亦可指“修天爵、合天德”的义理之天。在天人关系问题上,先秦哲人“重人事而轻鬼神”、“重相合而轻相分”,反对“蔽于天而不知人”,也反对“蔽于人而不知天”,认为如果“听于神而贬低人”、“崇天道而抑人伦”,就不能深谙至理、学际天人。

不论从宗教神学语义上论天人抑或是从“自然天成”语义上论天人,不论从道德蕴含上讲天人抑或是从“无为而治”上讲天人,先秦哲人都特别强调“天人一体”、辩证统一,因而“天人合一”始终是其哲学思想发展的主导方向和基本理路,这与西方哲学注重主客两离或者主客二分式的哲学有着重大差别,中国哲学驻足于天人之际,而西方哲学固执于天人对立。“欧洲近代史上占主导地位的哲学是‘主体性哲学’,其基本思维方式是‘主体—客体’式,亦即人与自然、我与非我的对立以及在此对立基础上的统一,这种哲学不同于中国传统不重主客之分的‘天人合一’思想。”^②这里仅以儒道两家在天人关系问题上的论争为视角,旨在从学理上讲清道家的自然之天与儒家的义理之天的根本区别,以便发展运用先秦儒道在天人之辩中所蕴含的现代价值,切当地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己和谐相处的当下关系,为推动社会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提供理性支持。

首先,道家推崇的自然之天与人的发展问题。老庄道学所说的“天”是自然之天,他们将人道合于天道,认为天人相合并合于天道,天人合一并归为自然。但唯有采取“损道”之法,才能达到“彼我玄同”、顺应天道。一方面,从现实意义上看,天人对立,并非一致,天道与人道常常互相背离。天道泛爱大众,

① 邵雍:《〈皇极经世〉导读》(常秉义注释),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版,第392页。

② 张世英:《美在自由——中欧美学思想比较研究》,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51页。

一视同仁且公正无私,但人却蔽于人事而不能奉行天道,以至于贫富不均而两极分化。因为“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道德经》六十四章)。另一方面,从理想层面看,人应取法乎上天而达到天人相合。“塞其兑,闭其门;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如何才能“法天立极”、与天为一?道家认为,必须重天道而轻人事,必须重损道而轻益道,因为“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有天下”(《道德经》四十一章)。

庄子承继了老子自然无为的思想,提出“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的主张,认为人唯有回归自然、顺应天道,不妄为、不作为,才能做到“游刃有余”、“无为而无不为”,让万物自生自灭、自定自化,自得自成、自适自善。老子认为,绝学无忧,绝思自由。“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因而人应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庄子据此而提出“齐万物”、“齐是非”,认为只有否定人为、弃绝是非、随缘任化、少私寡欲,才能做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而如果“以人助天”、“以人灭天”,时时处处“敖倪于万物”,焉能领悟“无为为之之谓天”之“天放”常则,而“安其性命之情”?老庄道学的这种“蔽于天而不知人”、以天道而泯人事的思想,影响久远。魏晋玄学那种崇虚贵无、企慕玄远,不务实事、挥麈清谈的社会风尚就渊源于此,主张“顺道自然,不造不始”,“因物自然,不设不施”。而如若推崇仁义,就“愈致斯伪”,因为“巧愈思精,伪愈多变,攻之弥甚,避之弥勤”。

老庄将天人合于自然,消人以归天命,可谓有利有弊。其利在于:将天视作自然而在的天然之物,将人诠释成自然天成的无为之人,它有见于自然而然之天,有见于真诚率性之人。其弊在于,它将人道直接归于天道,故而“蔽于天而不知人”、推崇天命而泯灭人性。以后的荀子正是看到了这一弊病,才提出“明与天人之分”的原则。照他看来,天道远而人道迩,二者相互分离,因为“产生万物和人类社会的是自然之天,而治理人类社会管理万物的是人,‘天能生物,不能辨物,土能载人,不能治人’”^①。天是大化流行之自然界,自然之

^① 吴毅等:《中华人文精神论纲》,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97页。

天有自己运行的通例与常则,其四时兴、百物生的各种活动都遵循自己的天然法则,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天不为人之恶寒而辍冬;地不为人之恶远而辍广”。天人各司其职,互不干预,尽管人事沧桑巨变,上天依然照常运行。天自然而然地繁育万物、四时更迭,不为而成、不求而得,这是自然之天职。

人应遵循天道无为之法则,履行天职,不能恣意参与或者改变它。只有“不与天争职”,才能还人为之天而成自然之天。与老庄有别,荀子强调,虽“天行有常”,人能知常而明道,且“明与天人之分”,但是,人对自然天道并非无动于衷、无所事事。人贵为天地之灵,能够知常而用之,知其所以参。“人能够兼收万物之能,得天地日月之用,故可云为万物之灵,贵于万物。”^①故能掌握自然运行的常则而为人所用,“知其所为,知其所不为”,使自在而在的天然之物转化为属人之物,使物为人而存在,“天地官而万物役”。荀子认为“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但是如果仅仅像老子那样满足于从天而思、从天而颂,望时而待、愿物自生,那就是“错人而思天”、坐而以待毙,人对天命所常、自然天道不仅应积极地“制之”、“用之”,而且要敢于“应时而使之”、“骋能而化之”,这样才能合乎万物常情,达到与天为一。

其次,儒家推崇的义理之天与人的发展问题。在天人关系问题上,儒家同样主张“天人合一”。然而他们所说的“天”不同于道家的自然之天,强调的是有道德蕴含的义理之天;他们所说的“人”也不是自在之人,而是“道成肉身”并以身体道的理想人格(圣人、至人、神人)。因而,他们所主张的天人相合,是合于义理而非合于自然,“天”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的本体而且是道德价值的本体。从理想层面看,圣人与义理之天直接合一,圣人就是天德的化身、就是义理的楷模。他作为道德价值的承载者和体现者,其所遵循的义理准则与道德规范,都源自天道、本于天道,天道与人道并非两个道,而是内在相通的一个道。

① 张立文:《天人之际:儒学与生态文明》,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28页。

但是这个天人相通的义理之道,并非人人都能秉持,只有所谓的圣贤之人,才能最大化地扩充自己的善性,从而以人事行天理,做到替天行道、与天合一。从现实层面说,现实的人应该达到与义理之天内在合一,并以天人合一作为自己人生追求的终极价值目标,尽管还没有达到这一目标,但是只要坚持不懈地努力终究能够实现这一理想。因为现实社会中的人,未必都是圣人,他们在一定程度上都使自己的善性受到戕害,未必能够充分地体现义理之天所具有的价值存在与道德诉求,人道与天德总有很大的实际差距。问题的关键在于,儒家主张天人不二,人道与天德原本一体,“现实的德性不完满的人”与“理想的德性完满的人”之间,并不存在互相隔断的天然鸿沟,而是互相打通的,现实的人经过努力修炼自己、尽可能扩充自己的善性,也可以把自己造就成为“循天德而行人事”的至人或者圣人,正所谓:满街都是圣人,人人皆可以为尧舜。

孟子将这两个层面分别称为“天爵”和“人爵”,“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共也。故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弃其天爵,则惑之甚者也,终亦必亡而已矣”(《孟子·告子上》)。在他看来,人之天爵源自义理之天的道德本性,它内在构成人的善良本质,根本不是外在强加给人的东西,对于现实的人来说,只要注意时时处处提升自我的道德本质,就可能获此天爵。所谓圣人就是懂得“修其天爵”的人,如“舜之居深山之中,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其所以异于深山之野人者,几希。及其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也”(《孟子·尽心上》)。而现实的人也能同样做到这一点,其成圣之路径就在于,“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只要尽心、知性就能知天、同天,达到“上下与天地同流”的至高境界。《易传》认为“天生神物”,而圣人“则之”、“效之”、“象之”,以成易理,易理是贯通天、地、人的三材之道,是广大悉备、包罗万象的最高准则,“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天道、地道、人道内在合一,都是易理在自然、社会与人生问题上的具体体现,“立天之道,曰阴曰阳;立地之道,曰刚曰柔;立人之道,曰仁曰义”。易理兼三材而两之,故成为人人追求的最高价值目标,把握了这种易理就能“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

《中庸》在天人关系问题上,也把人生价值的源头追溯到天命,认为天人相通,“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①。这表明,中庸之道本于天命,是天道与人道配合的最佳状态,也是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而“诚”乃是天人共通之性,既是天道的最高原则,也是做人的终极愿望,“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人只要达“诚”,就能真诚圆满地实现人生最高价值。

再次,儒道“天人之辩”关于人的发展问题的当代价值。论旧学是为了标新统,阐旧邦是为了赋新命。先秦儒道在天人关系上的争辩,蕴含着丰富的当代意义。具体表现在:

第一,先秦道家从复归自然、顺天而化、无为而治、“不与天争职”的最高价值理想与人生境界出发,强调通过“天人合一”而实现对自然“制之”、“用之”、“使之”、“化之”,达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己的和谐相处。这对于纠正当代那种把人与自然截然对立起来,主张以人为中心而一味向自然开战的错误观点,在当代不啻具有理论意义更具有实践意义。^② 近现代以来,随着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社会物质财富的快速增长,人们对自然盲目索取、肆意征服和非法掠夺的能力,正在达到无以复加、忘乎所以的地步,片面强调“人类中心主义”和科学理性至上,忽视了自然界对于人类生存的家园意识而错误地将二者对立起来。^③

特别是 20 世纪中期以后出现的,以原子能的利用、微电子技术和空间技术的开发与利用、新材料和新能源的开发与利用、生物和海洋工程的开发与利用为主要标志的现代科技革命,大大推进了当代人对自然的开发利用程度,深刻地影响与改变了人与自然和谐一体的关系,在促进社会进步以造福人类的

① 曾子、子思:《大学·中庸》,王国轩译注,中华书局 2006 年版,第 46 页。

② 参见宋志明等:《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55 页。

③ 参见陶德麟、王信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论域》,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21 页。

同时,也对自然生态造成严重损害,对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带来诸多消极后果。在当前,人口激增、粮食短缺、能源枯竭、资源颓废、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等等全球问题日益突出,内在反映了人类中心主义在处理人类与自然关系上的深层次矛盾。而先秦道家的那种“道法自然”、“无为而治”、“因物自然,不设不施”,以及“知其所为,知其所不为”的思想,对于克服当代人急功近利的狭隘视野,倡导以科学的自然观和发展观来矫治人与自然的尖锐对立,尊重、善待自然并合理而可持续地利用自然,从而达到人的自然化和自然的人化的内在统一,无论从理论上抑或实践上都将不无裨益。^①

第二,先秦儒家所主张的“天人合一”具有注重人生价值理性的特点,强调人类所遵循的义理准则与道德规范都“源自天道、本于天道”,天道与人道内在相通、“原本无二”,每个人只要最大化地扩充自己的善性,就能通过尽心、知性而知天、同天,从而做到“赞天地之化育”并以人事参天理,达到“合天德”、“一真如”的最佳境界。这种人文价值理想及其实现路径,对遏制当代科技理性过度膨胀而产生的价值负载,将会发挥重要的制衡及范导作用。

当代张欲扬利的全球化、市场化、商品化带来诸多负面效应:人对物的绝对依赖使之沦为金钱的奴隶,商品拜物教盛极一时,物欲横流难以遏止,利益矛盾全面凸显,生存悖论日益加剧;田园诗梦的破灭、心灵负荷的加重、人生意义的失落、精神信仰的迷惘,使得现代人际关系紧张、社会意识淡薄,精神空虚、魂如飘絮,孤独困惑、信任危机,信念价值体系崩塌、人伦道德底线损毁;唯利是图、尔虞我诈,生活腐化、精神堕落,及时行乐、玩世不恭,性情放荡、陷入荒诞,身份迷失、沦为他者。而传统儒家的价值理想及其涵养功夫,特别是其以人性价值为核心、将“义理之天”与自我提升内在统一,主张“天人一体”、主客互融的思想,对于我们“克服生活世界殖民化,阻止工具理性扩张,通过重建交往理性,实施商谈伦理,在道德意识中推进生活世界合理化”^②的发展,以

① 参见李为香:《先秦道家的天人之学及其现代价值——兼论先秦道家对社会伦理的弥补功能》,《济南大学学报》2007年第7期。

② 杨楹等:《马克思生活哲学引论——生活世界的哲学审视》,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08页。

及对找回当代人类失去的精神家园、重建道德理性支撑点、复归异化的人性本质、矫正狭隘的自私观念、促进社会文明和谐,都将产生不可替代的精神启迪作用。

第三,当代西方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及其所主导的自我崩溃的后现代解构策略,造成了“上帝之死”、“主体之死”和“人之死”,且随着新自由主义、普世价值理想、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及其主体性哲学的全面瓦解,“西方文化中心论”中所蕴含的人文之维、科学之维、价值之维与道德之维,在全球化语境下、在东西文明冲突中,正在迅速走向式微和凋敝。在人类文化发展史上,“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理论主张,不再成为乌托邦的梦想。而先秦儒道哲学中的“格致正诚、修齐治平”,“内圣外王、止于至善”的理性诉求;“生生不息、刚健有为”,“以人为本、有容乃大”的人性光辉;“向里用力、反身而诚”,“尽心知性、内在超越”的研究理路;“实事求是、辩证整合”,“知行合一、执两用中”的思维风格以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终极关怀等等,必将以中国特有的非凡气度与民族情怀融入世界文化洪流中,经过一场特殊的现代化、世界化的文化洗礼和实践改造,积极发挥其存世垂鉴、彰往昭来,资政育人、为民修志,传承文明、开拓创新的引领作用,从而确保其主导世界文化未来走向、激励中华民族再度崛起之中国梦必将早日变成现实。

第二节 心性哲学及其人学理想

中国心性论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核心要义在于:心是本体,一切皆由心生;只有尽心知性、涵养本心,才能心以成性,尽心成仁。但性毕竟无形影,只是心中之理,唯有求理于心才能觉识本心。况心性本净、心性本觉,常常须默然反己、直指本心,唯通过独化与自悟,才能通达心灵的玄冥之境,做到天人合一。若专注于文字或外物,只能“迷头认影”,丢失真我。由此可知,这种心性哲学具有“唯心是大”的主体性、“反身而诚”的内生性、“直指本心”的神秘性、心性一如的绝对性、体用一源的功能性等特征。从学理上弄清中国古代人